

馬華文學：記憶的詩學與大馬華人的歷史建構 ——兼及黃錦樹、李永平小說的文化表徵

蔣成浩

摘要 馬華文學是華文文學研究的重鎮，近年來，馬華文學取得了矚目的成績，新生代馬華作家以開創性的姿態進行文學創作。從李永平、張貴興到黃錦樹、黎紫書，他們以“小說家之筆”凝聚馬來西亞華人被壓抑的歷史記憶，與此同時又試圖擺脫“中國性”的“幽靈”對馬華文學主體性的遮蔽。華人文化在馬華作家筆下呈現出不同的樣態，諸如圖騰崇拜、甲骨迷戀、龍舟意象、舞獅活動，都成為大馬華人堅守與存續中華文化的表徵。歷史空間的重構與相伴始終的“中國性”迷思成為馬華作家必須直面的命題，亦為馬華作家的文學創作提供了不竭的資源與靈感。

關鍵詞：馬華文學；歷史空間；中國性；主體性

Abstract: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stands as a pivotal field within Chinese-language literary studies. In recent years, it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progress, with a new generation of Malaysian Chinese writers pioneering innovative literary practices. From Li Yongping and Zhang Guixing to Huang Jinshu and Li Zishu, these authors employ their “novelist pens” to crystallize the repressed historical memories of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ies, while simultaneously striving to transcend the overshadowing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ness” specter on the subjectivity of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In their works, Chinese cultural elements manifest in diverse forms—such as totem worship, oracle bone fascinations, dragon boat imagery, and lion dance traditions—all serving as representations of Malaysian Chinese perseverance in preserving and perpetuating Chinese culture. The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spaces and the enduring enigma of “Chineseness” have become unavoidable propositions for Malaysian Chinese writers, while also providing inexhaustible resources and inspiration for their literary creations.

Keywords: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Historical space; Chineseness; Subjectivity

二十世紀上半頁，就人口流動性而言，無疑是大移民時代。由於政治、經濟、戰爭等因素，大批華人移民南洋，馬來西亞成為華人移民的首要目的地。這段波瀾壯闊的華人移民史交織著血與淚，從“枝葉飄零”到“落地生根”，充滿傳奇故事。

在這漫長的歲月中，規模龐大的華人群體在東南亞形成了相對穩定的華族社群，他們在中華文化與在地文化之間尋找身份認同的平衡點，華族文化在不同程度上發生了形變，成為大馬華人的身份標識。同中國二十世紀的百年巨變一樣，“歷史”作為主體觀照的對象成為文學書寫的重要資源。在多維的歷史空間與後現代語境中，歷史不只一副面孔，而呈現出複雜的樣態，作家則以藝術的手段，通過不斷地追溯、回憶、想像來重構歷史空間。馬華作家對大馬華人歷史的書寫除了具有審美特徵外，還隱含著政治抵抗的詩學意味。如何書寫歷史？如何處理華人在歷史中遺留的傷痕？對馬華作家而言，文學與政治、“主體性”與“中國性”之間充滿了錯綜複雜的糾葛。

一、記憶迷宮：再造的華族歷史空間

關於歷史，保羅·利科（Paul Ricœur）認為“歷史是對事件的敘述，其餘的一切都來自於此。”¹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則指出“迷霧乃是歷史的本質空間。在迷霧中，歷史性的本來因素迷失於類似存在的東西（Seingleichen）中。因此，那種歷史性地出現的東西就必須被曲解。”²對於作家而言，如何“觀看”歷史，是其寫作中必須直面的問題。不同的歷史觀呈現不同的歷史風景，而史觀的形成又是作家思想、學識、經驗的投射。近百年來，大馬華人積澱了豐厚的歷史記憶，他們在歷史暴力中遭受的族群生存危機、戰爭體驗，以及個體命運的轉向，既跌宕起伏，又充滿傳奇色彩。在馬來西亞特定的歷史情境下，族群問題屢屢成為禁忌，大馬華人一度失去了為自己樹碑立傳的話語權力，面臨失語的危險。而馬華作家無法抗拒歷史的“誘惑”，肩負起凝聚歷史記憶的責任。他們試圖衝破政治的藩籬，手中之筆成為言說、銘記歷史的方式。相較於官方“正史”中族群敘事的宏大修辭，馬華作家更關注作為個體的大馬華人在歷史巨變中的愛欲悲歡，命運離合。人性的豐富性與可能性，始終是他們關注的焦點。

大馬獨立建國之際，舉國歡騰，不少華人也滿懷憧憬，他們具有強烈的公民意識，期待著能在國家政治、文化、經濟領域表達自己的訴求。然而，現實境況卻不容樂觀。當時，大馬華人佔國家總人口數的百分之二十五，族群之間的分化、對壘明顯，華人、馬來人、印度人佔據著國家機器中的不同部門，馬來人在政治

¹ 保羅·利科，《歷史與真理》，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95頁。

² 海德格爾，《林中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345頁。

上享有“特權”，華人在經濟上掌握著巨大優勢。英國殖民者退出東南亞後，歷史遺留下來的族群問題，迅速成為制約大馬社會發展的關鍵因素。一般而言“長期生活在東南亞的華人很少與本土人民發生文化衝突，只有當文化差異被政治化後，才產生了族群之間的緊張關係。”¹大馬不同族群之間的利益失衡，使整個社會潛伏著危機。1969 年“五·一三事件”²爆發，標識出大馬華人生存境遇的分水嶺。族群衝突後，一切政治憧憬皆成幻影。令華人感到絕望的不只是“五·一三事件”所帶來的暴力陰影，而是從此以後，大馬社會劃分出了“主人”與“寄居者”的兩種政治身份。在馬來人眼中，華人不可能成為馬來西亞人，也不可能在國家危機時誓死效忠馬來西亞，他們的華人身份就是一種“原罪”。³自大馬建國以來，以馬來人為主導的國家政權，接連出臺政策，旨在削弱華人在經濟、政治、文化上的地位。

“馬來人特權”⁴被納入到大馬的法律體系中，嚴重阻礙了族群之間的交流與融合。“寄居者”的身份在華人內心造成不可彌合的傷痕，不安全感如影隨形，而被歧視、被邊緣化的現實境遇激發起他們對文化之“根”的想像與重構。大馬華人的政治處境越壓抑，文化身份的建構就越得到強化，重構中華文化成為他們自我認同的重要方式。縱觀馬華文學，華人所遭受的苦難被反複書寫，在某種程度而言，這正是大馬華人在地經驗的表徵。因此，馬華作家重構華人歷史記憶的行為就具有了政治抵抗的意味。當歷史成為禁忌，書寫就是拒絕遺忘、抵抗匱乏的唯

¹ 陳志明，《遷徙、家鄉與認同——文化比較視野下的海外華人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年版，第 152 頁。

² 20 世紀 60 年代中後期，馬來西亞的族群矛盾日益尖銳。1969 年 5 月 10 日舉行的第三次全國大選，聯盟黨失利，而華人反對黨民主行動黨和民政黨的席位明顯增加，使馬來人充滿危機感，情緒激昂。巫統一些激進分子，認為馬來政治權力和其他特權已受到了嚴重和非分的挑戰。5 月 13 日，民主行動黨和民政黨的華人青年支持者舉行勝利遊行示威，遊行隊伍向雪蘭莪州務大臣拿督哈倫在吉隆坡的官邸前進時，與憤怒的馬來人發生衝突。騷亂自吉隆坡蔓延到其他地方，從衝撞發展到殺人、放火，混亂持續了近半個月，史稱“五·一三”族群衝突事件。參見廖小健，《戰後馬來西亞族群關係——華人與馬來人關係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2 年版，第 53 頁。

³ 歷史上，華僑華人問題是中國與僑居國關係處理中的一個脆弱和敏感的問題，並與中外關係事實上存在著相互影響的互動關係。一方面，因對華僑華人效忠產生懷疑，中國與一些僑居國關係的發展受到影響，並因而產生了中外關係史上獨特的“華僑華人問題”。隨著東南亞華人與中國經濟關係的日益密切，以及一度沉寂的華文教育和中華文化在東南亞地區的升溫，東南亞國家的“疑華”心理又有所抬頭。一些東南亞國家擔心華人的“中國情結”會不斷升級，華資流向大陸會有損所在國國家利益。這種疑慮，加上南中國海安全態勢的撲朔迷離，使得華人問題又變得有些敏感。參見張賽群，《華僑華人與“海絲之路”：作用、機制與展望》，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18 年版，第 196 頁。

⁴ “5·13”事件後，馬來民族主義情緒高漲。馬來西亞政府採取多項重大舉措維護馬來人的特權，保障馬來人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權利。政治上，馬來西亞重組執政聯盟，建立了以巫統為核心的“國民陣線”，馬來人成為國家的權力核心。經濟上，馬來西亞政府頒佈“新經濟政策”，提出重組社會、消除貧困的目標，馬來人的經濟地位由此得以改善，並獲得了諸多特權。文化上，政府實施國家文化政策，並出臺內閣教育報告書，全面鞏固和提升馬來文化、伊斯蘭教和馬來語的地位。馬來西亞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參見駱永昆，《馬來西亞通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3 年版，第 147 頁。

一方式。“五·一三事件”之後，大馬當局宣佈戒嚴，此後很長一段時間，族群問題、華人歷史問題都成為敏感的政治議題，凡有越界者，都會受到嚴厲的懲處。華人的歷史、文化隨著政治地位的邊緣化竟有被遺忘的可能，也面臨被主流歷史敘事篡改、歪曲的命運。馬華作家雲里風在回顧自己的創作時，動情的說“我總想起要怎樣去愛我所應該愛的人，去恨我所應恨的人，怎樣去攻擊強暴與奸邪，去頌揚公理與正義”。¹1980年代以來，大馬華人歷史與文化重構的重任落到了新生代馬華作家身上，一部分馬華作家寓居中國臺灣，他們穿透歷史蕪雜的表面，剝去被權力覆蓋的歷史面具，抽絲剝繭般地再現大馬華人的百年血淚史。

對於馬華作家而言，歷史書寫不是以再現歷史事件為目的，他們聚焦個體在歷史夾縫中所遭受的苦痛與掙扎，力圖呈現華人歷史記憶中的豐腴細節。黃錦樹的歷史書寫常以生活之“常”映照歷史之“變”，他不秉筆直書重大的歷史場景，而是將歷史事件融入到個體的日常生活當中，在個體命運的沉浮升降中勾勒出歷史的悲劇性所在。在黃錦樹的筆下，歷史總充滿情欲和暴力，他小說中的人物常被愛與性所折磨，到處是膨脹的慾望與亢奮的生殖力量。相較而言，同輩作家黎紫書對大馬歷史的書寫就顯得溫情脈脈，充溢著一種“陰性”氣質。不同時期的馬華作家，他們對華人歷史記憶的重構不盡相同，呈現出迥異的歷史風景。

新生代作家黃錦樹的創作與評論兼長。他的小說再再昭示出，文學與哲學一樣，要對“政治合理性導致的過度權力保持警覺。”²他以小說家之筆，重塑大馬華人的歷史記憶，同時也反抗著官方的宏大歷史敘述。2018年，黃錦樹的小說集《雨》在大陸出版，備受好評。在這部小說集中，黃錦樹不懈勘探個體與歷史之間的複雜關係。歷史總是隱藏著不可告人的秘密，就像馬來西亞碩大遼闊的熱帶雨林，微茫的個體忽然發覺自己置身其間，喪失了方向感、找不到命運的出口。雨林中的每一棵樹都滋長著一個秘密，每一片腐葉都宣示著死亡。進入歷史就像進入叢林，那種置身蒼莽雨林中產生的惶恐感與漂泊感正是大馬華人真切的歷史感受。黃錦樹對歷史的窺視欲不斷挑動著馬華作家敏感的神經，他們是無畏的勇士，試圖憑藉一己之力為歷史造像，文學成為他們介入歷史與現實的手段。

黃錦樹身在中國臺灣，但他心之所系卻是大馬本土，鄉土情感並未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散，反而曆久彌新，愈發強烈。來自原鄉的呼喚不斷地對身體與心靈

¹ 雲里風，《出路》，吉隆坡：馬來西亞青年書局，1985年版，第68頁。

² 米歇爾·福柯，〈主體和權力〉，《上海文化》06(2009):65。

進行“招魂”，就像早期移民者發現自己“回鄉”無望一樣，對黃錦樹而言，大馬亦是無法重返的原鄉，“對過去的對象的意識形態的批判正是為了開展我輩當下的歷史性，而把屬於歷史的還給歷史。”¹空間距離令他以“局外人”的視角來觀察大馬本土，並為重構歷史記憶提供了“旁觀自省”的可能。此外，現實境遇使馬華文學呈現出政治抵抗的姿態，正如許文榮所言，“文學在政治抗爭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容被忽視的，特別是華文文學由於不受官方所器重而使它輕易地避過官方的監視(華文報就沒有那麼幸運了)，同時由於語言的隔閡(以中文書寫)，主宰民族對它的干擾也微乎其微，這使它有更大的空間表徵自己更真實地再現/表現以及詮釋華人的政治理想與願望。”²長期以來，族群問題左右著大馬政治格局，種族之間的分離聚合牽動著大馬社會的神經末梢。“五·一三”種族暴動之後，大馬當局開始採取嚴厲的政治措施，在文化、經濟等方面著力於提高馬來人的特權地位。族群之間無法就現存問題達成共識，於是“沉默的抵抗”³就成了無奈的選擇。

以黃錦樹為代表的旅臺馬華作家取得了矚目的文學實績。他們身在臺灣，長期棲身於現代都市社會，感受著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的破碎與迷離。解構與重構、形式與內容、想像與再造為他們的文學書寫提供了新的資源。相較於大馬本土，旅臺馬華作家有著寬鬆的創作空間，他們以批判性的姿態直面政治與歷史。黃錦樹的小說火藥味十足，政治批判意味濃厚，他直面歷史沉痛、陰暗的一面，直面權力鬥爭的卑污，他習慣書寫族群政治對大馬華人造成的命運轉向及心靈創傷，這種創傷不僅僅為個體所遭受，而成為整個族群的普遍命運。歷史書寫成為大馬華人的生存策略，既然被拒絕、被邊緣、被視為寄居者，那麼最好的辦法就是向“過去”尋找慰藉，通過銘記歷史來彰顯自身的存在。“對過去念茲在茲，不只是為了彰顯運動的合理性和舊秩序的不合法性，也是為了強調現在只是過去與未來的過場。”⁴歷史在李永平、黎紫書、黃錦樹筆下，是想像的產物，它們從來都沒有清晰可見的線性脈絡，它們背負著太多的秘密隱匿於雨水豐沛的熱帶雨林中，等待“探險者”深入叢林，尋找“根”與歷史的傳說。

¹ 黃錦樹，《焚燒》，台北：麥田出版社，2007年版，第135頁。

² 許文榮，《南方喧嘩：馬華文學的抵抗詩學》，柔佛：柔佛南方學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31頁。

³ “沉默的抵抗”是“五·一三事件”之後，大馬華人表達政治訴求的方式。在“五·一三事件”之前，大馬華人積極介入政黨政治，希望以政治實踐來改善大馬華人的政治地位，成立“馬華公會”爭取政治權益。然而，“馬來人特權”體制在逐漸蠶食其他族群的政治利益，“五·一三事件”後，大馬華人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開始轉戰在文化領域，相較“五·一三事件”前的政治活動，文化“戰場”更像是“沉默的抵抗”。

⁴ 埃里克·霍弗，《狂熱分子：群眾運動聖經》，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58頁。

二、時空錯置中的原鄉想像

1980 年代以來的馬華文學形成一種獨特的現象，那就是作家主體的“所思”與“所在”、“當下”與“歷史”呈現出時空錯置的狀態。新生代馬華作家不甘囿於禁忌重重的馬華本土，紛紛選擇離家去國，“生存在別處”。其中選擇奔赴臺灣地區的馬華作家最為普遍，然而他們身在臺灣，文學創作的所思、所想卻又紮根在大馬本土，他們置身現代化的都市當中，卻對大馬本土的華人文化充滿迷狂的想像。因此在新生代馬華作家的作品裏，文化原鄉的想像是在時空錯置中展開的，新的經驗與舊的記憶相互交織，生成了獨特的文化形態與文學風景。

黃錦樹是一位頗具問題意識的作家、評論家，不可否認，臺灣的生活經驗為他拓展了更廣闊的文學空間，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深刻的影響了他的文學創作。黃錦樹對馬華文學追求的“現實主義”態度激進，他認為“現實主義”¹在馬華文學中已經被扭曲、機械化了，現實主義失去了它本然的面目，失去了寶貴的批判性質，意識形態化了的語言與辭彙越來越脫離實指。黃錦樹對馬華文學現實主義的批判有著堅實的現實基礎。現代社會的飛速發展、全球化不可阻擋的趨勢、都市文化空間的複雜性與碎片化使現實主義無法承載生活中出現的新境況。批判與再現是現實主義的兩個重要維度，但在現代社會，現實呈現出複雜的面孔，生活越來越難以被呈現、被感知，而個體面對的是消費符號表徵的物質世界與複雜的人際關係，以及被龐雜的資訊所裹挾時產生的幻滅感、荒誕感，這些都是現實主義無力“捕捉”的。黃錦樹不獨批判馬華文學尊奉的現實主義，他還對籠罩在馬華文學意識深處的“中國性幽靈”進行解構，試圖建立馬華文學的主體性地位。

李永平在馬華作家中成名較早，他以《吉陵春秋》享譽華語文壇，李永平早期的作品頗有世界意識。臺灣經驗給予他的是現代性的生活體驗及世界眼光，他不再將寫作主題局限於大馬本土，在《吉陵春秋》裏，他虛構出了想像的“中國空間”，建構出了他心目中的“唐山”。小說沒有交代具體的時間、地點，有關方位、國家等必要的背景都語焉不詳，但又處處充滿了中國元素。他為小鎮“吉陵”

¹ 這裏涉及到作家主體對“現實主義”之“現實”的理解。馬華文學自誕生以來，深受中國新文學的影響，尤其在中國左翼文學影響下，現實主義逐漸走向概念化、意識形態化，從而呈現出機械化的特徵。以此種“現實主義”為指導而創作出的文學作品，往往圖解現實政治，在階級話語、革命話語的影響下扭曲了本然的現實，是過於政治意識形態色彩的“現實”。作為新生代作家的黃錦樹以激烈的姿態批評以往馬華文學中占主流的“現實主義”思潮，馬華老作家“方北方”等被作為“反面教材”受到黃錦樹的批評，一時間在馬華文壇掀起波浪。

作傳，將兇殺、宿命、復仇等元素融入到“吉陵”的歷史文化空間中。李永平筆下的吉陵小鎮成為“古中國”千百年來的文化縮影，在封閉壓抑的空間氛圍裏，小說深入地剖析了人性陰暗的一面。對他而言，“《吉陵》是個象徵，《春秋》是一則寓言，《吉陵春秋》講述報應的故事——那亙古永恆、原始赤裸的東方式因果報應，蠱崇一整個支那城鎮的人心。”¹李永平與黃錦樹不同，李永平的小說裏很少出現獨立於小說人物的寫作主體的言說，讓人物如其所是，而黃錦樹的小說處處顯示出作家的主體意識，批判性時而凌駕於小說的審美性之上，他要借助小說達到重建大馬華人歷史記憶的目的。

旅臺馬華作家在臺灣的創作取得了矚目的成績，他們的“南洋書寫”贏得了臺灣讀者的認可。他們將南洋故事傳奇化、情欲化。小說中大馬華人命運的悲劇性引起同種同族的華人同胞的情感共鳴，讀者在閱讀中將“自我”情感投注到小說中的南洋世界，那是“中國人”經驗的延伸，已超越了地理空間的限制。旅臺馬華作家對南洋題材的“奇觀化”書寫曾引起批評家的注意，認為他們持有“自我東方主義”²的心態。後殖民理論之於馬華文學的闡釋有效性尚待商榷，重要的不是他們是否存在刻意取悅讀者、屈從市場的嫌疑，而是他們的南洋書寫在整個華語文學中是否達到了勘探人性、凝聚歷史記憶的新高度。旅臺馬華作家，“身”不在原鄉本土，“心”卻系在故鄉深處。時空距離的阻隔為作者觀察原鄉世界提供了新的視角，他們以更廣闊的文學視野，建構起純粹的、荒誕的、怪異的、崇高的文學空間，從而使南洋故事充滿豐富的張力。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相較於旅臺馬華作家，大馬本土作家的文學實績要遜色許多。1990 年代以來，黎紫書是最具代表性、影響最大的本土作家。但黎紫書也輾轉北京、美國與怡保之間。對作家做生活空間的考察並非是說大馬本土出現不了優秀的作家，而是為了強調在全球化的時代，文學場域、文化流通對作家創作的重要性。一方面，馬華文學長期以來被大馬當局有意邊緣化，大馬頒佈的“國家文學”³將馬華文學排斥在外，其發展得不到“主流”的認可，處於邊緣之邊緣的

¹ 金進，《馬華文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 年版，第 266 頁。

² “自我東方主義”是薩義德“東方主義”的延伸性理解，主要是指東方文化身份的作家，以西方想像自己的方式來想像自己、創造自己，從自己與西方文化的不同或差異裏去肯定自我和確認自我，在跨文化創作中進行“自我再現”，而這種“自我再現”往往與西方論述東方的刻板印象，或固定形象，也就是形象學所說的“套話”發生吻合，形成了與西方口味相同的“共謀”關係。參見高鴻，《跨文化的中國敘事——以賽珍珠、林語堂、湯亭亭為中心的討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5 年版，第 109 頁。

³ 馬來西亞國家文學是指馬來語創作的文學，1970 年代初正式確立馬來文學的國家文學地位，其他語言創作只能屬於族群文學。

尷尬境地，這樣的局面難免會挫傷馬華作家創作的積極性，不利於本土馬華文學生產。其次，大馬自實行“新經濟政策”¹以來，雖然社會更加穩定，但族群問題問題一直都是敏感的議題，本土作家不能也不願觸及這一禁忌地帶，如此種種，造成的局面是——大馬華人將近 700 萬，但從事文學創作的人鳳毛麟角，因此一直都未形成強大的文學場域，沒能營造活躍的馬華文學氛圍。由此不難看出，馬華本土作家相較於旅臺作家，在本土經驗上更有優勢，但他們所處的創作環境、文學場域卻遠不及後者得天獨厚。

文化原鄉本是作家最熟悉、最寶貴的創作資源，許多新生代馬華作離家去國，輾轉世界各地發展，這種“離散”狀態，卻和老一輩馬華作家的情感體驗與身份認同大相徑庭。老一輩華人遠離“中國”原鄉，背井離鄉、漂泊海外，遭受著戰火、暴力的摧殘，那是他們為了生存而不得已的選擇。而對於新一代華人而言，他們的“離散”狀態是自主的選擇，沒有饑餓的恐慌、也沒有戰亂的威脅，他們追求的是精神的自由與自我發展的憧憬。正如鍾怡雯所言“相對於曾經在中國大陸生活過的祖父或父親輩，馬來西亞第二代、第三代華人最直接的中國經驗，就是到中國大陸去旅行或探親……他們不像出生於中國的祖先想回到那塊土地。這些第二代、第三代的華人，在生活習慣上已深深本土化，其實已具備多重認同的身份。他們所認同的中國，純粹是以文化中國的形式而存在。”²從馬來西亞到中國臺灣，島與島之間，是不同的生活經驗。大馬本土的馬華作家小心翼翼的游離於言說的禁忌之間，原鄉就在自己腳下，然而文學場域、文學書寫的空間如此狹窄。“開口”卻不能“暢言”，“在”成了“不在”，言說成為欲說還休的遮掩。相較而言，旅臺馬華作家則不得不面對時空錯置中經驗的撕裂，對於大馬本土，他們處於“不在”而“在”的狀態，身不在此，意在此。

時空錯置越來越成為個體生活的常態。21 世紀以來，在科學技術與全球觀念的影響下，世界範圍內的移居、移民、遊學成為可能，越來越多的馬華本土作

¹ 1969 年 5 月 13 日馬來西亞爆發種族流血衝突後，政府當局制訂的一項長期的經濟政策。其目標是要在 20 年內達到：（1）不分種族地提高國民收入和增加就業機會，把貧困率從 1970 年的 49.3% 降低到 1990 年的 16.7%。（2）重組社會，減少、最終消除經濟上的種族差別。在 20 年間要使馬來族原住民資本所占比例從 2.4% 提高到 30%，華、印等非原住民的資本比例從 34.3% 提高到 40%，外國資本的比例從 63.3% 下降到 30%；馬來人在主要產業部門中的比重在 1990 年要達到 50% 以上。新經濟政策取得了許多預期的目標，但它限制和犧牲華人經濟的種族主義性質更引起中小華人資本和勞動階層的極大不滿。它加速了馬來社會內部的階級分化。當局決定，1990 年後不再繼續推行此項政策。參見朱庭光主編，《當代國際知識大辭典》，北京：團結出版社，1995 年版，第 403 頁。

² 鍾怡雯，〈從追尋到偽裝——馬華散文的中國困像〉，陳大為、鍾怡雯、胡金倫主編，《赤道回聲——馬華文學讀本》，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 年版，第 285 頁。

家不定期的寓居國外，與各國的作家、文學社團、文化機構進行交流互動，營造起良好的文學空間。馬華作家無論是旅居臺灣還是棲居本土，個體的經驗都需要不斷地拓展。良好的文學氛圍、寬鬆的創作環境、開放性的文化交流，以及便捷的文化資源的獲取都是影響馬華作家創作的重要因素。文化原鄉”越來越抽象化，身體從原鄉剝離，思想卻在原鄉生根發芽。可以預見，在今後很長一段時間，馬華作家必然要將混雜的個體經驗轉化為原鄉寫作的動力，以更為多元的視野重新觀照蕉風椰雨的南洋。

三、“中國性”的解構與重構

從二十世紀初開始，百年時間，華人迅速流布到世界各地，他們一度處於“失根”的狀態，在陌生的文化環境中艱難求生。當殘酷的生存現實阻斷了歸鄉的可能，“衣錦還鄉”註定無望，紮根異地則成為必然的選擇。對於新生代華人而言，父輩眼中的“異地”如今已成為熟悉的“故鄉”，在地域文化空間的形塑下，父輩們心心念念的“中國”不可避免地淪為想像的符碼。新生代華人出生在美國、澳洲、馬來西亞，出生地是他們的祖國，他們對故鄉充滿熱愛與憧憬。但對於大多數新生代華人而言，“中國性”的“幽靈”並未消失，它會在某個奇妙的時刻與主體身份產生微妙的聯繫，並形成多元的文化身份認同。

1917 年中國的新文學運動催生了馬華新文學，此後一段時間，馬華文學對中國新文學亦步亦趨，也同樣被興起的民族國家意識所裹挾，現實主義成為獨尊的創作手法。早期的馬華作家對於寫什麼題材並沒有太大的分歧，他們有著明確的身份認同，自覺以中國人自居。他們的文學創作則以反映華人生活、書寫中國風味為基本追求。在中國性的影響下，南洋更多的呈現出“他者”的特徵，“南洋是熱帶魅惑的神秘之地，是聚斂財富的淘金之處，是風情撩人的慾望之所，是遠離禮法的化外之邦，以及南洋本土人是沉默、懶惰和不開化的一群。”¹彼時，馬華作家雖然身處南洋，南洋卻只是“中國故事”的陪襯。但伴隨著大馬華人在本土紮根，就不得不正視馬華文學的屬性問題，於是書寫大馬本土風景、關注大馬現實境遇成為馬華作家的共識，馬華文學試圖逐步確立其主體性的地位。1990 年代，新生代作家、評論家黃錦樹在馬華文壇掀起一陣旋風，他提出的馬華文學“經

¹ 南治國，〈中國現代小說中的南洋之旅〉，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 2005 年博士論文，第 12 頁。

典缺席”、馬華文學“表演性”、“去中國性”等議題受到廣泛議論。新生代作家致力於建立馬華文學的主體地位，而非長期依附於中國文學，一味做中國文學的“支流”。他們主張以“在地經驗”為基礎，標識出馬華文學的特質。

“中國性”的“去”與“留”，與馬華文學主體性確立之間，是否就是二元對立的關係？一方面我們不能陷入“大中華主義”話語霸權的邏輯中，另一方面，也要避免將“中國性”賦予過多的政治意識形態內涵。所謂“中國性”，顧名思義是指中國特質、中國元素、中國想像，它能鮮明的標識出中國文化特性。它“主要是指向美學與文化上的意義，諸如中國神話、意象、意境、中國古典和現當代文庫以及中國的哲思，如儒、釋、道思想。”¹對於大馬華人而言，龐大的人口數量以及長期堅守的華校教育使中華文化的傳承成為可能。早期的大馬華人多是迫於生存壓力來到南洋，他們對“中國”情深意切，期盼能衣錦還鄉。然而，在殘酷的現實面前，他們不得不選擇紮根於此，中國文化與民間習俗也一同得到傳承。龐大的華人群體在複雜、艱難的現實境遇下不得不聯合起來。二十世紀初民族革命與國族觀念的興起更促使華人“想像共同體”的誕生。伴隨著民族主義浪潮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暴力接踵而至，造成無數華人的悲劇性命運。在極端的生存環境中，“中國想像”必然成為撫慰精神創傷的良藥。實際上，隨著時間的推移，想像中的“中國”與中國本身，已出現巨大的裂痕。早期華人面對戰亂、流離，只有向遙遠的過去“招魂”，至於“招”來的“中國”是否符合現實的“中國”，已經不重要了，它更多的發揮著宗教性的慰藉功能。即使馬來西亞獨立建國的後十餘年，大馬持中國國籍的華人依就占了很大一部分，因此不難理解為何早期馬華作家鍾情於“中國性”想像，他們時刻關注中國的動態，呼應中國的革命鬥爭，比大陸作家更苦心經營關於中國的一切。

南洋畢竟不是中國的“飛地”，越是時空錯置，對“中國性”的堅守越顯得孤絕。黃錦樹有關馬華文學“表演性”的論述雖尖刻卻充滿洞見，他梳理了大馬華人“共同體意識”建構的歷史過程，指出“文化客體化，傳統中華文化之創造往往是一種公開化的表演式的活動，表征為一種集體性的公開演出。”²大馬龐大的華人群體，為基於“文化表演”的共同體的形成提供了必要基礎。黃錦樹觀察到，華人社會中

¹ 許文榮，〈馬華文學中的三江並流：論中國性、本土性與現代性的微妙同構〉，《華文文學》01(2010):40。

² 黃錦樹，《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台北：麥田出版社，2012年版，第69頁。

的各種文化節，如文學節、端午節、春節等，以及競賽性質的文化項目，諸如書法、象棋、文學等，已經深入到華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這些具有文化展演性質的活動，經由媒體的追蹤報道，建構起大馬華人的文化標識。華人在大馬政治生態中長期處於不利地位，被邊緣的處境使得華人轉向文化內部，通過傳承中華文化、堅守華文教育以建構鮮明的族群標識。一方面，華人遠離想像的中國，另一方面，華文文化畢竟不是主流文化，需要他們有意識的承襲，甚至必須借助宣傳、教育來延續下去。如大馬華人在節日中組織的“舞獅”活動，就具有“文化表演”的典型特性。舞獅活動作為中華節慶的一部分，自然是大馬華人對傳統的繼承，但當老一代華人凋零殆盡，“舞獅”活動之於其他族群與大馬政府，它的表演意義、展示意義、宣誓意義與凝聚意義已佔據主要位置。在教育方面，馬來西亞華文教育一直處於被國家政策壓制的狀態，華校無法得到教育部門的補貼，只能由華人社群出資負責日常的教育運行。¹在華校內部，新生代華人學習漢字、中國文學、歷史等課程，重構著“中國性”。

馬華作家對“中國性”有著不同的態度，並由此呈現出不同的文學觀念。在李永平的文學世界中，他一直醉心於對“中國”的想像，他精心錘煉漢字、試圖尋找漢字最純粹的一面，發揮漢字的張力以建構起想像的中國空間。傳統文化“本身是絕對富有生氣的東西，它具有極大的可變性。”²1986年，李永平的長篇小說《吉陵春秋》問世，這部作品為其贏得了巨大的聲譽，李永平通過“吉陵”小鎮虛構出他魂牽夢繞的“中國”。這部小說的語言獨具特色，李永平將方塊的漢字看作有生命的事物，並試圖祛除意識形態、政治與道德對漢字的規約，還原文字最本真、最富有包容性的狀態。“民族的語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語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過了任何想像。”³李永平試圖以漢字為介質，還原“純粹”的中國。在他的文本裏，大到文化氛圍，小到勾欄瓦舍、飲食衣著、車馬出行，到處都是古中國的意象符號。小說對故事發生的時間、朝代都語焉不詳，它是一

¹ 馬來西亞華人社團的華文教育早在 19 世紀初就以私塾的形式出現在馬來半島等地。近兩百年來，經過華人社團的苦心經營和努力爭取，馬來西亞華文教育體系得到逐漸完善，已經成為除中國大陸、臺灣地區港澳地區以外唯一擁有自小學到大學完整華文教育體系的國家。儘管漢語不是馬來西亞官方語言，華文教育也一直受到馬來西亞政府的各種限制，但隨著現今馬來西亞國內各族群關係的逐漸緩和，以及在董教總為首的華教團體努力爭取下，華文教育呈現出了良好的發展勢頭。參見楊佳〈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現狀評介〉，《世界華文教育》01，2016 年版，第 50 頁。

² 本雅明，《單向街》，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5 年版，第 81 頁。

³ 洪堡特，《論人類的語言結構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年版，第 70 頁。

段架空的歷史，人物虛構、故事虛構、時間與空間都是虛構，而敘述本身亦是虛構，至此，作者苦心建構的“中國”大廈已無真實的可能，它註定不能存在於世，只是作者一個人“張燈結綵”的“中國性”想像。李永平的中國情結，並非實體，而是一種文化圖騰的想像，王德威指出“李永平這位來自南洋的‘僑生’，一心嚮往中國。但他心目中的中國與其說是政治實體，不如說是文化圖騰，而這圖騰的終極表現就在方塊字上。李對中文的崇拜摩挲，讓他力求在紙上構築一個想像的原鄉，但在這個文字魅影的城國裏，那歷史的中國已經暗暗地被消解了。”¹李永平並不拒斥“中國性”元素，相反，他的文學寫作始終在“中國性”元素中汲取營養。難能可貴的是，他對“中國”的想像與再造，絕少有政治意識形態的因素，更多的是虔敬的美學追求。李永平不斷想像中國、審視中國，他悲傷的發現，那個傳統的圖騰信仰般的“中國”在現代都市生活中逐漸消逝、淪亡，因此他小說總充斥著挽歌的情調。

“李永平所承續的是白先勇一脈的家國飄零意識和現代主義精神。”²他像一位技藝高超的工匠，仔細打磨手下的藝術品，他用語言建構起一座“傳統中國”的大廈。因此，在《吉陵春秋》裏，李永平自覺把中國性元素融入其中，小說語言頗顯古奧，承續了傳統小說的語言風格，改變了西化語言的表達邏輯。在某種程度上而言，馬來西亞龐大的華人族群與堅守百年的華文教育使得馬華作家註定無法擺脫“中國性”的影響，祛除“中國性”無異於“抽血剔筋”。只是，“中國性”並不構成馬華文學主體性建構的羈絆，而是馬華文學重要的文化資源。

結語

馬華作家以文學書寫的方式，重構著大馬華人的歷史記憶。對他們而言，大馬華人的歷史記憶晦暗不明，在“馬來人優先”的族群政治中竟有失語的危險。馬華作家有意肩負起重構歷史記憶的責任，大馬華人近百年來被戰爭、族群衝突、政治暴力不斷侵擾的歷史，就像是馬來西亞遼闊的熱帶雨林，靜默無言，充滿神秘感與生命力，而書寫歷史就是深入雨林進行探險和揭秘的過程。這段歷史曾一度被官方話語所遮蔽，在新生代馬華作家筆下又再度復活。李永平、黃錦樹為代表的馬華作家以手中之筆講述著華人的血淚歷史，華人文化在他們筆下呈現出多

¹ 王德威，《原鄉想像，浪子文學——李永平論》，《江蘇社會科學》04（2004）：101。

² 朱立立，《閱讀華文離散敘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2頁。

元的面貌。與此同時，馬華文學的發展又始終伴隨著“中國性”與“去中國性”的爭論。實際上，在全球化的現實語境下，“中國性”與馬華文學主體性之間，並不構成二元對立的關係。我們既要力避陷入“大中華主義”的話語霸權中，也要警惕把“中國性”過度意識形態化。在某種程度上而言，文化意義上的中國性是馬華作家的身份標識，也是他們文學創作的不懈資源。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

Author Affiliation: Nanjing University